

●张术早

中国古代私藏典籍的收集

ABSTRACT It's a painstaking effort to collect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of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printed books, the key way for the collectors to get books and records was the official gran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copying was the main style for the collectors through the ages, especially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to acquire them. After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urchase became the main channel.

SUBJECT TERMS Private collections—China—Ancient times

CLASS NUMBER G258.83

我国典籍的私家收藏自春秋战国发源以后,经过无数典籍收藏家的不懈努力和追求,历经二千多年的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典籍收藏体系之一。它与其他典籍收藏体系一起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我国丰富的文化典籍,在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古代,私人收藏典籍最困难的是典籍的收集,由于当时科学技术落后,典籍的生产困难,其产量非常有限。历代政府以一国之力获取典籍尚且不易,个人要获得典籍就更加困难。清代著名学者孙庆增在其《藏书纪要》中指出私人收藏典籍有“六难”:“知有是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难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至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不能搜之于书佣,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不知远购,五难也;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辩论字纸,贸贸

购求,每多缺佚,终无善本,六难也。”即使如此,历代的典籍收藏家仍把典籍收集当作一种乐事,所谓“购求典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他们无不孜孜以求,甚至倾家荡产。南北朝历宋、齐两朝的典籍收藏家刘善明一生苦聚典籍,到南齐建元二年(480年)死时,“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南齐书·刘善明传》)。后魏元顺以全部家财收藏典籍,死后“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而已”(《魏书·元顺传》)。南宋著名藏书家井度“至领四川转运使,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有“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之句,言明自己“要与万卷归林庐”(《雨后极凉料简篋中旧书有感》诗)。他一生苦搜典籍,其室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其“饮

食起居, 疾病呻吟, 悲忧愤叹, 未尝不与书俱”, 故而他戏称自己的居室为“书巢”。明代著名典籍收藏家胡应麟“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 ……以嗜书故, 有所购访, 时时乞月俸, 不给, 则脱妇簪珥以酬之。又不给, 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囊无所不倾, 而独其载书, 陆则惠子, 水则米生, 盖十余岁, 而尽毁其家以为书, 录其余资, 以治屋而藏焉”(王世贞《二酉山房记》)。明代阎起山为了广聚典籍, 带家中唯一的书僮, “日走从人家借书, 手抄口吟, 日夜不休, 所获学俸尽费为书资, 家贫不能炊, 质衣而玩, 其书不忍弃, 竟以积劳得疾, 正德丁卯(507年)正月乙亥卒, 年二十四”(蒋镜寰《吴中先哲藏书考略》)。青春之躯竟殉于典籍收藏之劳。明代另一位著名典籍收藏家王世贞一生痴求典籍, 不但购买了三千多卷宋代精槧, 而且以一座庄园换得一部《汉书》。后人诗赞其执著: “得一奇书失一庄, 团焦犹恋旧青箱。眼前束笋呼奴子, 身后骈枝问货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正是有了历朝历代无数象他们这样的典籍收藏家呕心沥血的收集, 才终于建立起了我国延绵几千年的典籍私家收藏体系, 他们搜寻之艰苦, 追求之执著, 可歌可泣。这种穷搜苦寻的精神构成了一种贯穿于我国整个典籍私家收藏史的优良传统。

由于典籍生产方式的落后, 我国古代典籍收藏家获得典籍的途径非常有限, 其中主要有政府赐书、抄写、购求等。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政府赐书是某些幸运的典籍收藏家获得典籍的重要途径。

政府赐书最早起源于西汉。西汉立国以后, 废除秦代的“挟书令”, 建藏书之策, 置写书之官, 开献书之路, 多次向民间访求典籍。百年之内, 所求典籍积如山丘, 政府藏书很快丰富起来, 并且开始有了复

(副)本。为了显示皇恩浩荡, 笼络王公大臣和文人学士, 同时也作为鼓励私人收藏典籍的一种姿态, 西汉政府就将政府所藏中的副本赐予有关人员。汉成帝时, 班斿为“右曹中郎将, 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 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 上器其能, 赐以秘书之副”(《汉书·叙传》)。班斿是西汉著名的典籍收藏家, 政府赐书对他建立自己的藏书体系有很大的帮助。东汉政府沿袭了西汉的赐书制度, 赐书的对象主要是诸侯王、有功的将军和大臣, 对诸侯王的赐书甚至成为一种例行之事。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 东平王刘苍上朝求书, 帝允, 并赐之以秘书列仙图和道术秘方典籍(《渊鉴类函》卷一九四)。东汉末期的蔡邕由于博学多才和在整理公藏典籍、抄刻“熹平石经”中的卓越成就, 政府赐予典籍四千卷, 成为汉魏时期著名的典籍收藏家。魏晋南北朝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典籍私家收藏较发达的时期, 其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与政府赐书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 政府赐书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超过前朝。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 “诏赐会稽王秘阁书八千卷”; “何无忌在秘阁求赐秘书, 诏与一千卷”; “宋赐河西王蒙逊《周易》及子集诸书”; “晋安王子懋, 武帝第七子也, 启求所好书, 武帝曰: ‘知汝常以读书为心也。’ 赐以杜预所写《左传》及古今善言”。这些赐书数量已相当大, 足以使受赐者成为典籍收藏大家。梁代著名典籍收藏家江总即“家传赐书数千卷”。

宋代以后, 由于全社会典籍数量的增加, 个人获得典籍相对较易。因此, 虽然政府赐书的制度一直在延续, 但在私人典籍收藏家的典籍来源中所占的位置已大大下降了。这时的赐书更多的是对典籍收藏家的嘉奖和鼓励, 如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对进献私藏典籍五百种以上的浙江

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及两淮之马裕四家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对其他进献典籍百种以上的士民官吏则各赐《佩文韵府》一部。

政府的赐书只有少数典籍收藏家可以获得,大部分人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典籍,而抄写是历代典籍收藏家特别是宋以前的典籍收藏家获得典籍的主要方式。

在我国古代,典籍生产稀少,流传面窄,个人获得典籍十分不易。大多数爱书成癖、积书成癖的收藏家为了获得所求典籍,建立自己的典籍收藏体系,不惜费时费力,辗转抄录,许多人“平日皆以钞书为课,无间寒暑”(孙庆增《藏书纪要》)。南北朝时期的典籍收藏家沈麟士家藏典籍数千卷,然一场大火使其所度化为灰烬,时沈年逾八旬,但为了重新获得典籍,他毅然抄书,“手写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箱”(《渊鉴类函》卷九四)。后魏著名典籍收藏家穆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北史·穆子容传》),完全靠抄录而成典籍收藏大家。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南史·袁峻传》)。梁代另一位典籍收藏家王筠,其所藏大部分通过抄录所得,他“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假手,并躬自抄录《梁书·王筠传》)。

印刷术发明以后,典籍的生产技术大大改进,大量典籍通过官私刊刻通行于世,使典籍的社会拥有量增加,个人获得典籍相对较易。但由于交通闭塞,购求困难,同时,抄书“有底本,底本便于改正,钞本定其字画,于是钞录之书,比之刊刻者更

贵且重焉。况书籍中之秘本,为当世罕见者。非钞录,则不可得,又安可以忽哉?”(孙庆增《藏书纪要·钞录》)因而,诸典籍收藏家仍把抄书作为获取典籍的重要途径。

宋代的藏书家王钦臣为了保证所藏典籍质量,抄录典籍非常精细,“每年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有些“每册不过三四十页”的书,“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人及弟子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不得已不见也。”其所藏宋槧皆精善,全得益于斯(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元代的庄肃“性嗜书,聚书至八万卷,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元代另一据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典籍收藏家孙道明“家于泗泾,乃一市井人也。在胜国时,日惟以钞书为乐,其手钞书几千卷,今尚有流传者,好事者以重价购之。”其所藏之书大部分为抄录所聚,至八旬高龄亦抄书不止,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的《自号录》一卷书后即题:“至正十八年戊戌之秋七月旦日,钞于泗北村居之映雪斋,时年六十六”(“映雪斋”为孙道明的书斋名),钱氏所著录的另一部书《临汉隐居诗话》后则有“洪武九年丙辰,映雪老人写于华亭集贤外坡草舍雨窗,时年八十”的题记。钱曾曾说:“予见道明所钞书不下十数种,皆在崦嵫景迫之年,老而好学,真炳烛之明也”(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其所抄之书流传至清代,仅钱氏一人所见其老时所抄之书即有几十种,孙道明抄书之富由此可见。

明清两代是我国典籍私家收藏发展的顶峰时期,此时虽刻印典籍布于天下,但以抄录收集典籍者并不逊于他朝。明代著名典籍收藏家谢肇淛一生勤抄苦写,收藏宏富。他在自己的抄本王禹偁的《小畜

集》跋中说：“余少时得元之诗文数篇，读而善之，锐欲见其全集而不可得”，后来几经周折，终于“从相国叶进卿先生借得内府宋本”，于是冒着严寒，连夜抄录，虽十指如槌，但仍抄书不止。明季清初著名的典籍收藏家和出版家毛晋并非出身书香门第，却从小喜欢读书抄书，每一种书“得即手自钞写，纠讹谬，补遗亡，即蛛丝鼠坏，风雨润湿之所糜败者，一一整顿之”。并且发明了一种“影抄”的方法，凡是世所罕见而藏诸他处不能获得的宋本精刻，他都选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者皆争仿效。这种方法不但使他获得大量珍贵的宋元精槧，而且“宋槧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经过几十年的勤访苦求，所收藏的典籍达到84000多卷。清代以抄录收集典籍的藏书家就更多了。叶奕“笃好奇书古帙，搜访不遗余力。每见案头一帙，必假归躬自缮写，篝灯命笔，夜分不休”，而且与著名典籍收藏家钱曾约定：如“获得秘册，即互相传录，虽错昏夜叩门，两家童子闻声知之，好事极矣。”他曾为了影摹一本北宋时期的残本不惜费时费力，逾年方成。清人吴焯为抄全一部《咸淳临安志》，竟费时十载，“《咸淳临安志》，原本旧藏朱氏曝书亭，今入桐乡江氏书库，世人不得见矣。所阙者凡七卷，竹垞平生之搜括，竟不能见，……康熙辛卯，从马氏借钞，予钱二十千，凡三年，仅得半部。更请于书主綉谷亭别令楷书生录完，……历十余年，至雍正元年”方成一完书（吴寿钺《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三）。著名学者朱彝尊为了抄录一部好书更是苦心孤诣。“朱彝尊好书，自通籍后，又借钞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塘龚氏各家之书，所藏日益富。”他曾供职于明史馆，后因抄书而罢官。“康熙二十四年，彝尊典

试江右，与遵王（钱曾）会于白下，求一见之（钱氏《读书敏求记》），终不肯出，乃置酒，召诸名士高燕，遵王与焉。私以黄金及青鼠裘，予其待史，启篋得之。雇藩署廊吏数十人，于密室中半宵写毕。并录得绝好词一卷”（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二）。为抄一部书使出如此非常手段，古人抄书之难可见一斑。

由于抄录典籍费时费力，有些为了更快更多地抄录典籍，常常雇人抄录，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专事此业的人员——“佣书”。“佣书”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张仪苏秦二人同志，递翦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书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渊鉴类函》卷一九四）。可见自典籍私家收藏出现之时，即有此类从业人员。以后随着典籍私家收藏的发展，历朝历代都有许多人从事过这一职业。由于在抄书过程中，“佣书”者可以遍览典籍，因此很多著名学者都当过“佣书”。汉代“班超孝谨家贫，常为佣书以供养（家人）”（《后汉书·班超传》）；南北朝时期著名典籍收藏家王僧儒曾因家贫常“佣书养母”（《梁书·王僧儒传》）；后魏“崔亮家贫，佣书自业”（《渊鉴类函》卷一九四）。很多的典籍收藏家都曾雇“佣书”抄录典籍，明代典籍收藏家毛晋即雇有二千人为其抄写典籍，以至“入门僮仆尽抄书”（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代另一位典籍收藏家范钦之从子范大彻“酷嗜钞书，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后从其父游京师，在“长安邸中，所养书佣多至二三十人”（《鄞县志》卷三十六）。

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普遍使用，典籍生产方式有了极大的改进，典籍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加，仅仅通过人工抄写无法大量获得典籍。

为了能尽可能多地收集典籍，购买就成为主要收集途径，而图书交易的出现使典籍收藏家通过购买收藏典籍具有了可能性。

据《三辅黄图·明堂》记载，早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已有了图书买卖活动，而到东汉，则出现了初具规模的“书肆”。著名学者王充少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卖书”（《后汉书·王充传》）。唐代不但在坊市中设有书肆，而且还有专门在长安和洛阳两都之间贩卖和典当典籍的书肆。但在宋代以前可以买卖的典籍数量极其有限，因此，当时通过购买获得典籍只不过是一种补充手段。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书肆至明清时期已相当发达，成为典籍收藏家收集典籍的重要场所。康熙时，北京的“慈仁寺书肆”盛极一时，时人有“独买残编古寺中”，“慈仁廊下觅尚书”的诗句，当时一些著名的典籍收藏家如王士禛、朱彝尊、孙星衍等都曾在此寻觅过不少珍本秘籍。

除了通过书肆购买典籍以外，历代的典籍收藏家还通过其他方式购买典籍以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典籍收藏体系。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为了收集典籍，特以金帛求购于四方，民间多有献书于他，使其所藏几乎同汉政府的公藏相等，当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各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渊鉴类函》卷一九四）。五代时后唐典籍收藏家王都于后梁初亡时，趁战乱藏书之家书散之机，令人广将金帛收市图书，“以得为务，不责贵贱”，藏书一下子达到万卷之巨（《旧五代史·王都传》）；丁凯则倾其家产广购典籍，使所藏典籍达到八千卷。宋代米昂“所得俸赐，以三分之一购奇书，以讽诵为乐”；而“郭永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家藏书万卷。”（《宋史·文苑传》）。元代沈景春“平生寡嗜欲，惟

酷好收书。……人有挟书求售，至必劳来之，饮食之，酬之以善价，于是奇书多归沈氏”（李青莲《苕宋楼藏书志》卷四）。以如此优惠条件施于售书者，何愁购集不到好书。更有段直在泽州为官时，甚至割良田千亩以购典籍，从而使其所藏典籍达到万卷（《元史·段直传》）。明清以后，以购求收集典籍越来越普遍，典籍收藏家为了购求典籍更是不遗余力。明代谢兆中生平好书，尽其家资购求异书，收集典籍达五六万卷，室中无他家什，四面皆书，余空仅容一身。沈节甫“无他嗜好，独甚爱书，每遇货书者，惟恐其不余售，且去惟恐其不复来也。”但囊中羞涩，力不从心，无法多购善书，只能“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残阙，必手自订补，以成完帙”（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序》）。胡应麟为了购金华典籍收藏家虞参政后人所售的家藏，真可谓煞费苦心。他听说虞家子孙要出售所藏，于是“啖以重价，给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事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戚居中减价售之。计所得不什之一也。”购得虞氏藏书，胡应麟“遂以书雄海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清代著名典籍收藏家马寒中“购书不遗余力。尝过龙山查氏，见案头有宋槧陆状元《通鉴》，百计购之，不可。后查氏谋葬所亲，所卜吉坏，则马氏田也。寒中觐知之，大喜曰：‘书可得！’即诣查氏，愿效纺田之易。凡十亩，书券尽付焉。抱书疾归，惟恐其中悔也。”（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通鉴条）。其购书之迫切，无以复加。

明清两代，我国典籍私家收藏已十分发达，收藏典籍数万至十数万卷的收藏家大有人在，但或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或由于家道中落，不断有典籍收藏家的所藏

典籍散逸,于是有许多人通过购得他们的散逸典籍而成为典籍收藏大家。上述胡应麟得虞氏藏书而宏富海内;范钦由于购得丰氏万卷楼所藏而奠定了“天一阁”的藏书基础,明代藩王典籍收藏家的代表朱睦㮮因尽收江都葛氏、章邱李氏之书,再加他所到之处即写录、补缀,使其所藏达五万卷。清代,有钱谦益购集赵氏脉望馆珍藏而成绛云楼;黄宗羲购祁氏澹生堂而成典籍收藏大家。这种购集不但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典籍收藏体系,而且使这一时期的私藏典籍有了一种承继关系,使诸家所藏精品得以流传下来。

除了这三种主要的典籍收集渠道以外,有些人因获得赠书而成为典籍收藏大家。最早赠书于人的是汉代著名学者、典籍收藏家蔡邕。蔡邕因赏识王粲的学识将自己所藏近万卷典籍赠与当时只有十四岁、默默无闻的王粲。蔡邕的赠书使王粲一举成为当时著名的典籍收藏家。蔡邕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此后历代都有典籍收藏家赠书的佳话,他们无不以蔡邕自比,

从而形成了我国典籍私家收藏史上一个优良的传统。南北朝时期梁代著名典籍收藏家沈约也是因为赞赏王筠的才学而效蔡邕之法赠书于他,使王筠所藏名重一时。梁代的另一位典籍收藏家刘显也将自己毕生所藏全部赠给了孔奂。宋代晁公武其家传典籍毁于火灾、兵燹,正当他感叹无书可藏时,当时另一位藏书家井度将自己所收集的五十余车典籍全部赠送,使他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典籍收藏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名垂青史的《郡斋读书志》。清代钱谦在其绛云楼受祝融之灾后,将幸存的典籍大部分赠给了钱曾,使他奠定了自己的典籍收藏基础,并成为清代最著名的典籍收藏家之一。

张木早 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为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通讯地址:北京天津街7号。邮编100034。

(来稿时间:1996—03—14。编发者:黄文田。)

(上接第52页)

- 业.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23
- 4 J·H·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72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 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64
- 6 同4:56,65
- 8 宓浩. 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46
- 9 同5:20
- 10 赵成山. “读者至上,服务第一”是我国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方针. 图书馆学刊,1996

- 11 赵成山. 图书馆学交流说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21(6):25~31
- 12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等. 周文骏论文选. 成都:成都东方图书馆研究所,1988:39
- 13 于鸣镝. 谐振律——图书馆工作的基本规律. 图书与情报,1993,(3)
- 14 同4:68~69,95~96

赵成山 辽宁省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九纬路21号,邮编110003。

(来稿时间:1996—01—02。编发者:徐苇。)